

◀ (上接 14 版)

经历的大的制度变革以及印刷革命相关。

秦燕春在《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》一书中简单列举过清末出版的顾炎武著作,比如,点石斋的石印本《日知录集释》,扫叶山房的刻本《圣安纪事》,味静斋的《顾亭林先生诗笺》,校经山房的《圣安纪事》,图书集成局的铅印本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。其中,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在道咸以降,特别是光绪年间,出版较为集中。晚清上海发生的印刷革命为之提供了条件。1880 年代开始,西方传入的石印技术取代传统的雕版印刷,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时代。石印业相对于雕版印刷,有许多优势。雕版书字不能太小,而字大,书就贵,照相石印可以把字缩得很小,书价就便宜,读书人买得起。石印制版容易:“大抵刻板粗笨,成书不易,而刻工嘉者殊鲜。坊间刻本字迹类多模糊,且一书之版多至叠床架屋。读者、藏版者往往苦之。然有(石)版则可随时刷印,不计多寡,非其利欤?活版则排印甚速,字迹清明,价值又廉,流传甚广。”而且,更重要的,石印非常高效,“印速甚快”、“制作甚奇”,比如文明书局,机器全部开足运营,每日能印书 20 余万页。

印刷革命使得从前那些不便流传、少量流传的书籍开始大量出现在市场。早期,石印业

的主要业务就是课艺书,印刷诸如《康熙字典》《策学备纂》等士子应试书籍,由于印刷便捷,并且能印刷刷珍本,携带方便,一时需求量大增,而石印书局也因此获利甚丰,并愈发引起聚合效应,光绪年间,上海的石印书局超过八十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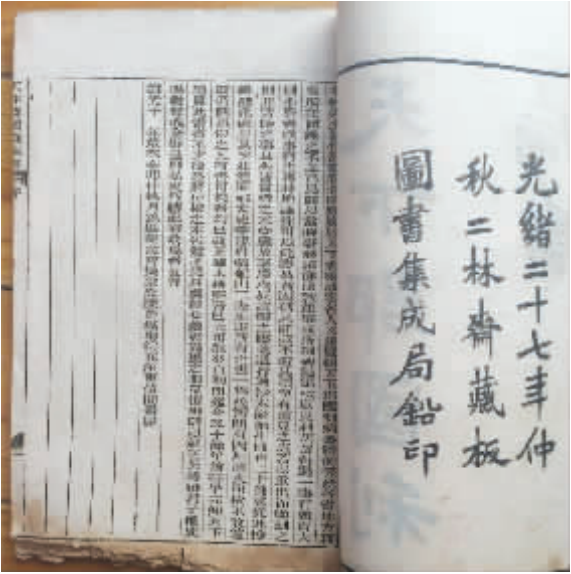
课艺书之外,戊戌以降的科举改革又使得各类西政时务、经济史论类的图书成为石印书坊的营业重心。其中,顾炎武著作在晚清上海新式印刷业中成为利藪,亦与废八股、改策论的制度变革有莫大关系。

1898 年 8 月《申报》上有题为《论改试策论后士人家塾诵习课程》的论说:“今之势固急经济而缓词章也”,所以,除传统必读之书,古近名人论经济的文章亦不可不读;而《海国图志》《瀛寰志略》之类有关中国与世界的时务书,更应“次第阅识”,在家塾中或令初学者取报章分别句读,“以清纹理”。经济文章应当成为圣贤文章之外的必读书目。《申报》时务书广告中有言:“自科场改制之诏下,坊肆所出近人策论几于充栋汗牛。”《日知录》《明夷待访录》《通鉴》等史论书籍也因为改试策论而畅销起来。1901 年《申报》上《劝诫学生文》:“今之所谓学者,时文而已,诗赋而已,小楷而已,训诂而已。问有能以历代政术为学者乎?无有也。问有能以本朝掌故以为学者乎?无有也。问有能以天下郡国利病为学者乎?亦无有也。”是以

人才不兴、国势不振。作者于是呼吁广设学堂,习有用之学。《得气之先》一文,论及八股取士时代,国家崇尚时艺,士子沉埋八股,无复有宏通淹雅之才者,“方今朝廷锐意求新,废除八股取士,改试策论,首重经世有用之学”。

与朝廷改科举政令衔接会通的,1880 年代开始,各地书院、学堂的课题已经日益明显地向时务策论倾斜。涉及亭林及其经世学问的试题便不少。比如,1881 年宁波辩志文会课题,舆地类:“读顾亭林郡县论书后”;1889 年辩志文会课题,舆地类:“读读史方輿纪要书后,读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后。间经济六科:一曰内政,以考求方輿险要、郡国利病、民情风俗者隶之,凡有志应此科者,平日宜若何肄习,斯成有用之才,盍各抒所见”。1889 年上海求志书院课题,掌故类:“问黄氏明夷待访录与顾氏日知论治孰优”;1891 年求志书院课题,掌故类:“拟顾亭林郡县论”;1901 年求志书院夏季课题,掌故类:“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后”,秋季课题,掌故兼时务类:“孙夏峰、顾亭林、黄梨洲、李二曲四先生论赞”。1900 年湖北黄冈文童调覆题:“论国初四君子,论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胡石庄”;汉阳凤山书院策题:“顾亭林谓治乱之关在人心风俗,而转移人心、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不可阙,试即教化纲纪详言之”。1901 年,江西学政吴士鉴在署甄别经训书院肄业生,出题:“拟顾亭林郡县论”。1901 年江西萍乡县令顾家相课试书院,以经策命题,时务兼西政类:“顾亭林黄梨洲皆主变法论”。1901 山东巡抚袁世凯试办济南大学堂,学堂章程中开列书目即有《日知录集释》和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。

提倡实学的朝廷政令,以及废八股、改试策论的制度改革,其影响非常直接地投射到了林立于上海的各新式石印书坊。“亭林先生旷代通儒”的出版广告遍布 1880 年代以降的各类书刊杂志。1882 年文玉山房发售顾亭林所著《菰中随笔》,“足补日知录之阙,版久浸毁,今复重梓,虽编帙无多而碎金片羽弥可宝贵”。1885 年扫叶山房出版《亭林先生续遗书十种》,“当世博雅之士、讲求经世有用之学者,当必先睹为快也”。次年扫叶山房又印成《顾亭林遗书二十种》,“足为后学之津梁,且夕观玩,其嘉惠士林实非浅鲜”。1886 年,点石斋石印《日知录集释》,称日知录集释久已行世,因木刻不爽目又难携带,而此书翻刻日多、伪谬日甚,是以重新石印编订,



铅印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,光绪图书集成局版

“谈经世之学者,此书实枕中鸿宝也”。点石斋的这部书一直到 1900 年代早期,还在持续翻印出版,足见受欢迎。1888 年,慎记书庄将《日知录》与《策学纂要》合编,石印出版,这显然也与改试策论密切相关。1894 年扫叶山房石印《顾亭林遗书汇辑》,1900 年著易堂书局出版《日知录校正》。1899 年,图书集成局所出“新印大字本读史方輿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”,以上等洁白连泗纸印成,钉装六十本,外加锯木大箱,每部售洋十二元,直以“方今诏求变政,各省设立学堂,每以策论命题”,“海内有志之士欲讲求经济学问者,则此二书不可不备”为广告语。1901 年,慎记书庄石印《读史方輿纪要》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,亦称国家力求实学,出版此书,既为留心经济者,亦为朝廷明诏的经济特科:“昆山顾氏所著,久已海内风行,士林望重,诚以天下之輿图关乎史学,不考古今何以识山川之要,不综源委何以知形势之全。方今海钥宏开,华洋错杂,重洋远隔,都邑边防,昧焉不察,不且貽舍本逐末之诮乎?本庄觅得善本原书,爱倩文人抄录,付诸石印,前印之书早经售罄,复印者现在所存无多,留心时事者宜速购为妙。”1903 年,点石斋以“投时利器”为题,持续在《申报》上为其所出《日知录》《通鉴辑览》等书刊登广告,称其为“切于时用者”。点石斋所出《读史方輿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》,广告中称“非为射利起见,冀广流传”,嘉惠士林,并为各省学堂应用时务所参考。1904 年上海棋盘街文瑞楼《新印大字本读史方輿纪要郡国利病书》《新编皇朝藩属輿地丛书》:舆地之学,一为慎重边疆,另外也为“乡会试策题、学院观风,每多边事命题”、“各省府厅州县学堂以及上年考试优贡,无不以边事輿地命题”,裨益政治实为旗帜,因其为科举参考书而大

能赢利,则是更重要的原因。胡思敬《国闻备乘》中记:“自科场废八股改试策论,又废科举改学堂,《日知录》《明夷待访录》《读通鉴论》三书盛行于世。”章士钊说顾氏《日知录》的重获盛行,即与科考策论有极大关系:“顾氏《日知录》者固国闻中之良书也。数年前石印,书贾发行之数,不下十万,其所以然者,乃以其言蕴藉,而且殚洽于试场之吞剥,与国中治国闻者之级数,毫无比较之关系。”而章太炎的《煊书》,章士钊认为其价值与顾氏之书不相上下,然而由于文义艰深,更重要的是与时务策论关系不大,因此不获流行。陆费逵也回忆,因为科举改革,要考史鉴策论,“于是《廿四史》《九通》《纲鉴》以及各种论说,又复盛行一时。”商务印书馆新印《历代通鉴辑览》和船山《读通鉴论》(附宋论)),也在广告中称“二书于考试学堂需用皆急,特坊间并无佳本,士林憾之”。

顾炎武著作所收获的营业胜利,是国政、启蒙与生意多方交汇而成的结果。晚清士林的顾著阅读,既有曾国藩、章太炎这样的大儒,为经国大业、学术传承、道德接续;亦有汲汲为功名计、为稻粮谋的芸芸读书人。季明之遗老,在变动的历史语境中,被反复、不同鹄的、不同层次地援引,思想也因此 in 流行中获得了更多的意义。但亭林所讲“治道”,并无法跨越君主制的界线。而时移事易,此时谈论经世,已着意于政体变更,并终而演变为国体彻底改变。在此后的中国思想界,讨论与纠葛的问题,则许多已脱开了亭林、梨洲所思所虑的君国框架。如何把彼时先贤的经义贯通入此时的经世,变化之谓为通,这既是晚清士林的命题,也是政乱战乱丛集的民国永无穷尽的命题。此正应潘耒所说:“先生非一世之人,此书非一世之书也。”(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)



1901 年《申报》刊载的《劝诫学生文》